

normal undergraduate," states *Sibley's Harvard* is unusual fines and only one large bill for book later studied law at the Inner Temple in London. In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he el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pirates but was a controversial political figure. For of his life, he was the colony's autocratic chief justice. Cotton, Nathaniel, and Samuel Mather—sons of Increase Mather—were present prodigies. Cotton, the oldest, was 11 years old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

蔡新乐 著

fifteen when he graduated in 1678; his brothers at sixteen. Cotton excelled in ancient languages self during church sermons by taking notes in Latin and no doubt as a child, he seems to have been a prodigy. "I am able with little study to write in several languages," he declared; "I feast myself with the sweets of all the more polite part of mankind ordinarily produced." Over his study door was a warning to visitors: "I supported the Salem witch trials of 1692 and later taught himself in the Collegiate School of Connecticut, where he was at Yale at his suggestion. Mather was offered Yale's presidency; he declined it; he wished to be president of Harvard, but he never was; over, however, on three occasions.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ollege do again . . . treat me with their usual

rote in 1724, after the third rebuff.

appealing prodigy was Truman Henry

child in Royalton, Vermont, he received

ity as a "lightning calculator" that he was invited

examined by a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Sciences. At the behest of President Edward Everett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

—— 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

蔡新乐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 / 蔡新乐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10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7-5327-3847-7

I. 翻... II. 蔡... III. 翻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15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翻译的本体论研究

——翻译研究的第三条道路、主体间性与人的元翻译构成

蔡新乐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28,000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100 册

ISBN 7-5327-3847-7/H·712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总序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5年9月18日于南京大学

前言

这本小书的撰写,目的是想以个人的思考所获,走出翻译的“科学观”和“艺术观”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峙局面。当然了,这或许只是一种奢望。不过,翻译理论的确不应该只是徘徊在“科学观”和“艺术观”所含有的工具论与艺术论的两极之间,进而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多元的视角,可能为翻译研究展现出新的途径。而我们这本书里所要做的,则是想从翻译与人的关系这一视角入手,来考察它的历史性及其背后隐含的人本身的“构成”问题。这里说的“构成”,是指人本身的意识指向与转化、变易以及更改意义上的翻译之间的关系背后所具有的那种自我保护或保守倾向。换言之,我们认为,只有在认可了人的个体性的情况下,才能有针对性地去探索这一由个体及其差异形成的翻译世界,以及这一世界所以得以成就自身的多元的格局。因而,我们在书中提出了人的“元翻译构成”。

可以认为,这种“元翻译构成”就是多元格局的基础或根基。假若没有个体性的对自我统一性(unity)以及它的个性(identity)的保护意识,翻译便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这种交流的立足点在于,人维护自身完整性的需要,因而支撑它的可能就是某种“反交流的结构”:交流本身是无法以它自身的力量作为出发点的。在这个意义上,人的个体的完整性,构筑

出文化的基本形态:它凭借自身、依靠自身的结构、通过自身意识的构成以及精神力量,并且为了自身存在的需要,去寻求交流和翻译。人不是在她/他自身之外去思考,因而才能在她/他自身之外展示这样的思考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样的可能性之中才含有翻译本身的可能性,原因是后者潜在地、隐含性地寓于人的思想之中。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想观点。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思想中,人是历史性的人,而不是,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结构化了”的人。因而,她/他与她/他所置身其间的文化,是一体的。所以,一方面,人需要立足于相对稳定的元状态或者说“元翻译构成”,因为这是交流以及翻译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她/他们还必须扩大精神自由的范围,而且这种扩大不应该表现为对他人的精神侵入或伤害。但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侵入与伤害没有发生过。或许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无数次血的教训,已经充分显示了种种灾难的成因与翻译不无关系,至少是同总是表现为某种形态的“中心主义”以及将自身作为“真理”的拥有者试图以“启蒙”为名同化一切异己力量的努力——这样的趋势下出现的翻译不无关系,同浸染在以掠夺物质资源,因而需要文化思想的强势压榨,并且最终影响到或试图实现生活方式的一体化气氛之中的翻译概念与实践活动不无关系。因而,我们在探讨翻译的时候,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必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这样做,当然是要认真面对并如实地描述历史,并且在诸多阴影的“衬托”下,突出某种切实的东西。至少是要突出,在多元文化与语境的格局这一前提之下,翻译的作用以及意义。不难设想,人假若丧失了诸多语言并存、诸多文化共在的局面,翻译是否还会真的存在。因而,只有勇于认可不同的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同特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差异的作用与影响,我们才有可能吸取历史的教训,真正将翻译同人的历史变化、人的历

史意义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提出“人的元翻译构成”可能会导致一种误解:这同翻译本身又有什么关系?的确,如果是仅仅从纯粹的技术性的翻译来看,或者说仅仅将翻译视为一种技术的话,那么,这样的疑惑应该说自有它的道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人还没有完全陷入“科学主义”的思想陷阱、成为人造的机器或者具有这方面的倾向的话,那么,似乎就必须承认,人一定要具有超越她/他的创造物的“跨历史意识”。原因很明显,假若不能从自身的创造成果或结果之中摆脱出来,人便有可能转化成“物”的僵化与“去生命”的格调,或者也有可能化为像“物”一样仅仅具有“实用性的”价值,即工具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对“现代性”这一问题不断反思、批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不仅仅拥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启蒙”以及“单向度”的“人”的构成,人之为入首先在于她/他的复杂与丰富,而那是“科学主义”的“现代性”所无法把握的、也无法面对的。否则,它便只能形成否定自身的某种东西。这方面的思想成果,也应该为翻译理论的研究输入一些必要的营养,至少是能有利于翻译理论摆脱“工具论”的束缚。

因而,很明显,一方面,我们不愿再看到以翻译为名进行的文化扩展与精神同化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至少是在研究翻译的思想和理论文本的书写之中;而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同时摆脱“科学主义”的机械化以及自动化的阴影,在思想上真正体现出人向她/他自身的回归。换言之,在我们看来,翻译研究既不应该只是把人当作一种因素、一种物或者一种无足轻重的“背景知识”,同时也不应该将人视为工具或工具(翻译)之中的工具——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的人。

还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思想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一切现象,至少不具备人们在过去有意无意所极力显现的那种“普遍性”^①。因此,我们试图从“现象学”析入,但并没有完全依赖现象学,而只是把它当作讨论的资

料:一方面,对“现象学”的理论思考引出了钱锺书的“不隔”的理想翻译境界,使我们看到现实之中的翻译与之相反,正好是在“间(间隔)”之中进行的。另一方面,在中华文化的思想宝库之中,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可以使我们根据这一思路比较充分地展示翻译在现实之中的功能发挥与作用行使。翻译,毕竟是现实之中的翻译,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即使在概念意义上,它的指向也总是在一个“空间”内生成。所以,很难设想,假若没有容纳它的“空间”,翻译会在哪里出现。因此,我们在讨论问题时,与其说是体现西化(或西方的)理论的“普遍规律”,不如说,我们所做的是一种尝试:将中华文化中有关“间”的思想,运用到解释翻译的存在状态及其基本意义指向的探讨上来。应该强调的是,不管是翻译的存在状态还是它的意义指向,都是同人的存在及其文化密切相关的,所以在理论上自然不能将这二者截然分开。

因此,可以看出,我们的这种思路,可能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思路,而且似乎有自我封闭的嫌疑。但是,如果真正关注翻译本身的那种存在态势,关注翻译对人应该起到的保护作用,我们似乎就应该承认,保守主义的倾向,如果它是指对人自身完整性的“保守”,那么,它就应该可以而且也能突出人的个体特性,而与以往炫耀“科学主义”的、一味追求“统一”的工具论恰恰是相互反动的。也就是说,保守主义的翻译研究思想,如果能够在人的自身对个体的保护、维护和保守这方面起到解释的作用,那么,作为一种思路,也并没有什么错误。今天,“科学主义”所要求的所谓“发展”与“进步”的无限制倾向,已经遭遇到一定程度的反思,因而在现实生活之中也已经得到相应的遏制。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不对翻译理论探讨之中所出现的那种类似的、一味求新求异的动态,进行必要的反思:只要理论不是旨在体现权力意志或权威意识,它就似乎也应该将这种话语视为一种对话,一种要求交流、批评以及平等的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以某种

姿态追求模式的统一,是不应该出现在“现代性”已经成为必须质疑的问题的翻译理论的论坛上的。

不过,我们的思考,也只是个人近年来的读书感受,其中自然包含着疑问、试探以及想象。言说的“可行性”或许不会成为问题,但个人的话语是否“有益”而且“有效”,只能通过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和反思才能有一个相对性的答案。正因为有疑问,才要付诸笔墨,向读者请教。

本书的第一章开门见山,提出了“走向第三条道路”这个问题。第二章解释“第三条道路”究竟是指什么。

第三章是对德里达翻译思想的尝试性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探求西方的“巴别塔”或“理性主义”以外的翻译思想的可能性。其中,也牵涉到对奈达的翻译理论的反思和批评。第四章则以明末清初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的过程中的几种“解释实践”(事件)为实例,试图说明历史上的“翻译”或者说翻译的历史性本身是强势话语的实施,对中华文化的肆意解读无异于对其中生存者们的“强暴”性“定性”。我们认为,这种“现代性”的倾向,始终是“科学主义”的力量显示——既是它的信仰的力量表现,也是它的宗教意识的极限化表露。因此,所谓“一体化”,隐藏着以强势话语损毁别种语言的表达力和生命力的趋势,进而可能会起到削弱弱势文化的自我保护及防御能力甚至使之逐渐消亡的作用。所谓的“全球化”,如果从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语言的多样性的不断消解来看,其中或许正含有翻译的悲哀。因为,翻译本身在做着灭亡自身的游戏:消除自身赖以存在的语言的多样性条件之下的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因此,也就在第四章,围绕着“神意”或“神启”的“一体化”趋势,我们对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对中华文化当中的几个基本概念的曲意解释进行了分析,以举例说明对文化多样性根源上的打击何以影响到文化本身的生存以及其中含有的荒诞和反理性倾向。但是,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反理性

的浪潮当中,某些“西化”思想以其疯狂的解构倾向消解着我们的文化,使之平面化——去掉任何意义上的深度与奥妙的意味,进而使之成为完全实用性的“物”。文化家园的丧失,伴随着语言的“革命”或语言的符号系统的“别种语言格局化”——使之向强势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性”现代语言靠近,并且以便于交流和交际的名义,不仅改写着这种语言的历史,而且最大限度地将其结构向某种“一体化”调整。似乎只有如此,只有使语言形式得到同化,翻译才能找到最终的落脚点和目的地。这,已经成为翻译的负面效应的反映,在翻译研究当中是不应该忽视的。

前言

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对翻译的负面作用的轻视或视而不见,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翻译的交流当中所应有的平等意识的认可。因此,对这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探讨,既可能是对某种殖民主义症结的正视,同时也是民族语言的独立性的一种体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只是某种初步的工作:试图点出某些问题当中所含有的荒诞性。

在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当中,还有一个方面的问题历来不被人重视。这就是,翻译同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人在翻译当中的作用。以往的种种探讨,在出发点上根本就没有重视人对翻译的作用,或者说至少是在这方面没有产生必要的“问题意识”,因而也就没有进行必要的课题化。我们认为,这是极不严肃的,因为至少是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翻译是人的文化或跨文化活动,因而它的一切表现都是人在其文化创造和构成当中所必须面对的。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自身的问题——不仅仅是翻译的可操作性、实践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或跨文化的作用与意义的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必然触及人的本体论对于翻译会具有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说,人本身是如何在根本上促成翻译及其可能性的。这同样也是翻译研究所应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

可是,我们目前对翻译的生成机理的探讨,往往只是就翻译过程本身

的可操作性进行的探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经验的总结上,或者是就作为一种言语运作的翻译,即对翻译的语言能力与转化功能所做的一些的基本探索。但是,这样的探索,既不能说明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无助于突出人的主体的形成与作用发挥。人的主体意识虽说并没有在翻译当中丧失,但在翻译理论的探讨当中也没有得到体现。本来是人的翻译,却成了翻译的翻译,人不是在理论当中被异化了吗?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我们不是最终要还原人的努力,以力求这种努力是为人服务的吗?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翻译才可能是为人的,才可能是属于人的活动;而不是在工具主义的程式化的运作之中的那种人被工具化的表现,更不是人在翻译之中总是要向什么存在物表示效忠的那种“科学主义”的理论趋向?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深思的。

这里,我们希望做到的只是,对“主体间性”问题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将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理论,是大有必要的。这是因为,第一,我们如果首先对翻译的基本结构进行揭示或说明,而不是先行说明翻译背后的创造者,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目的的。假若还像过去那样,只是一味地突出翻译过程当中如何使翻译操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类的问题,那么,显而易见,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突出人的主体的自觉性以及主体对于翻译所形成的先决条件。因而,主体对翻译的重要性,应该是研究翻译形成的首要课题之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目前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突出单一主体的作用,而不顾及翻译的对话性质及其牵涉到的各个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众多主体的创发作用。因此,第二,我们或许已经再也不能单独地、单一地看待翻译本身的主体的独特性质,不能再将主体只是看作某一种单一的存在者或纯粹的存在物,而是要将它视为复杂的、多方面的存在者。它是关系的结晶,也是关系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的主体应该是“间主体”,而不是过去说的“(单纯的)主体”。第三,“间

主体”是主体的呈现或走向,也是它的最终目的。那么,翻译在它的创造之中,才会是真正多元的、对话的、多角度的、多形态的。换言之,翻译才可能是复合型的,而不是单一化的。有违于这种趋势的理论探讨,可能都会造成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单一的主体,怎么能够“跨越文化”的种种障碍,进而形成文化本身的多元格局?或许正因为翻译本身的这种多元文化格局的呈现,我们才能真正面对人的一个基本存在动态:人不是纯粹的,而是文化杂多的,是文化杂多成就的。最后,主体不仅仅在翻译之中出现,而是先行存在于翻译之前以及翻译之上。因而,主体的“间”能够显现出翻译的指向,也就能够勾画出翻译的基本运动:翻译就在人与人之间,也就在人本身之间,而且是人的这种“间”促成了翻译的可能性以及可行性或可操作性。

因此,不但不能将翻译的主体间性归入“无用”。恰恰相反,我们应该首先承认,它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我们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还可以继续说明它的重要意义:

第一,“主体间性”是胡塞尔晚年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有人甚至认为,这一概念早在与黑格尔同时代的费希特的哲学之中已经初见端倪。^②它是由传统哲学中的“独断论”(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向当代哲学的“多元论”的一种转折。虽然它还没有充分表现出巴赫金所说的“众声喧哗”,但毕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转折来看待。这也说明,从哲学史的演进来看,它是不可否认的,也不是可以用什么刀子就能剃得掉的:历史无法更改。

第二,任何交流所牵涉到的,都决不会是一个单一的纯粹主体。翻译也是如此。因此,正如上述,对主体的单一性的着意突出,可能是很多翻译理论的致命伤。以对话的最基本形式而论,交流一定是在主体之间进行的。即便是“人机对话”,也要强调“互动作用”。其他情况,也就可想而知

知了。换句话说,生活当中充满了“主体间”或“间主体”这种“结构”。因此,除了正视它,认真探讨它同翻译的关系之外,我们似乎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此,现实本身,也不可能让我们对“主体间性”提出异议。

第三,翻译是两个主体、两种语言或文化的“间形态”,这或许是它最基本的形式。它背后的创造者应该是“间主体”。后者如果要同“杂合”相联系的话,那只能说明任何人、人类文化、语言都不是纯粹的。或许,也只有这样,才有文化存在的可能性。所谓近亲繁殖导致残疾与灾难,或许也适用于文化创造。所以,许慎的《说文解字》在解释“文”一字时指出:“文,错画也,像交文。”人是多种“源”的产物,文化是多民族交流的结果,“文字”也同样是“错综混杂”而成的。我们可以在考古学家李济、苏秉琦以及张光直等的有关论著当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和材料:所谓“中华文明(化)”在史前史时期就已经是一种“混合性”的文明。这说明,多元状态是自古就有的。而多元,反映在思想上,或许只能说明,主体是杂合而成的“间主体”。我们在面对一个对象时,一定要把它视为一个整体。这样也就简化了它的复杂性、多重性以及多元格局。但在认识过程当中,则应还原它应有的多元状态。这一点或许能够说明,就人的思想现实而论,主体间性自有它的存在根本,思想本身的“间性”也不容否认。

以此为根据,本书的第五章试图详细探讨的是,在中华文化的思想资源当中,“间”可能对翻译当中的主体间性的理论意义及其解释作用。换言之,我们认为,“间”的“中华个性”,有可能为进一步认识主体间性,梳理出新的理论渠道和思想脉络。

不过,在肯定主体间性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所谓“之间”应该是“主体”“之间”,是某种“二者”“之间”,而且融会了这二者之间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之间”首先是以主体为出发点或根本前提的。换言之,主体性先于主体间性,也就比后者更能代表人的精神:自由与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精